

《重構台灣》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重構台灣》

13位ISBN编号：9789570841176

10位ISBN编号：9570841176

出版时间：2012-12-20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蕭阿勤

页数：4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內容概要

1980、199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

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關鍵的二十年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蕭阿勤以《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一書

做了深入清楚的描述與分析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全書共分七章，及兩篇附錄，分析焦點從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一些文學和語言的爭議、改革運動，到戰後的三十年台灣社會變遷，包括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在文學領域的發展、台語（福佬話）復興運動、台灣集體記憶、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等。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是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

在這二十年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

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等，是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主要部分。

《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紀錄1980、1990年代台灣重大的文化政治變遷，

關注這二十年間文學、語言與歷史三個領域，

研究本省籍「人文知識分子」在台灣民族主義的國族建構中的角色與作用，

探討他們所從事的文化活動如何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政治的重要部分，

又如何成為塑造「台灣性」（Taiwaneseness）或台灣國族特性的重要力量。

內文試閱

（節錄）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到現在為止，我們對於遠古時期的台灣歷史仍然所知無幾。學者們也不確定中國大陸的居民是何時得知這個島嶼的存在，並且渡海來台（Hsu 1980: 3, 5）。零星的歷史紀錄告訴我們，自十六世紀後半葉起，漁民、販夫走卒與探險者從中國東南邊靠近台灣的福建省遷徙來台（陳紹馨 1979a [1966]: 452）。在那之前，不少源自亞洲東南部、使用馬來-波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 family）語言的原住民，早就定居於此。中國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過去四個多世紀以來，在不同統治政權同化政策的影響下，加上原住民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地位持續低落，使得原住民的語言逐漸式微。

到了十七世紀末，來自中國的漢人移民才開始在台灣占據主導的地位。漢人人口自此以後便持續增加（陳紹馨 1979a [1966]: 453）。為了掃蕩明朝滅亡後敗逃來台的殘存效忠者，滿清帝國於1683年入侵台灣，並統治台灣至1895年。清朝統治期間，雖然滿清帝國曾禁絕合法遷徙的管道，唯恐台灣再度成為反抗者的藏身之地，但是貧困的漢人仍然不斷移入，爭奪土地。幾乎所有落腳台灣的移民，都來自中國南方兩個省份：福建和廣東。來自福建的移民，依據其故鄉所在地，可區分為「漳州人」與「泉州人」。儘管這兩群人說的是不同腔調的「閩南語」，但他們都被統稱為「福佬人」或「河洛人」，他們的語言也被稱為「福佬話」或「河洛話」。第三種漢人移民是客家人，他們主要從廣東遷徙而來並講客家話。

到了十九世紀，大約80%的漢人移民來自漳泉兩地，福佬話因此成為台灣的主要語言。相對的，廣東移民則約占總人口的15%，客家話在社會上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清朝統治時期，漳州、泉州與廣東移民彼此都將對方看成異於自己的人群。他們之間經常基於這種不同的集體認同，競爭土地或其他經濟資源。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這些資源競奪，造成這三群移民之間頻繁劇烈的武裝衝突（黃秀政 1992: 52-54）。

滿清帝國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於1895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勝利者。在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台灣的漢人主要以「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府城人」、「鹿港人」等以地域為主的方式自稱或相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主要由於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對立，才產生了所謂「台灣人」、「台語」或「台灣話」的概念範疇。「台灣人」指的是漢人，而不管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原鄉是不是有所不同。「台語」或「台灣話」則指稱台灣本地主要的語言，亦即福佬話。某些情形下，「台灣話」也包含客家話。對於漢人來說，這些分類方式代表著在外來統治者

底下所萌生的認同感（許極燉 1993: 40-43）。

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統治台灣。由於殖民統治時期前二十年的軍事鎮壓，台灣人的武力反抗運動遭到全面瓦解。到了1920年代，則出現了受民主、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等當代政治思潮所影響的台灣人非武力的反殖民運動。然而二〇年代末，所有台灣人激進的、左翼的反殖民組織——他們大致都追求台灣人從殖民統治的全面解放——完全被殖民政府壓制。至於選擇溫和的改良主義路線的反殖民運動，則持續低調地追求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自治。但是1937年當日本與中國再度開戰後，這一類溫和的運動也被迫終止（見第二章的討論）。

在此同時，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推翻了滿人主宰的大清帝國，建立了中華民國。1919年，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為國民黨）成立，它由孫中山所組織的幾個政治團體演變而來，並且在孫中山過世之後，由蔣介石領導而統治全中國。就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言，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的對台政策仍舊十分模糊。在1943年12月的開羅宣言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明白宣布「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雖然在前一年，中國外交部曾經做過類似的宣稱，但中國收復失土的立場，卻是在開羅會議上才首次獲得國際承認（鄭梓 1991: 218-219）。

後來隨著日本戰敗，蔣介石的軍隊在1945年秋天接收台灣，台灣也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一般而言，台灣民眾相當歡迎國民黨政府官員與軍隊的到來。不過沒有多久，台灣人便因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壓迫、經濟混亂，和政策上對台灣人的歧視而大失所望。1947年春天發生一連串激烈反抗國民黨的事件，擴及全島，最終導致血腥鎮壓，這就是「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使得台灣人，或者說「本省人」，與剛從大陸來台的「外省人」的關係明顯惡化。事件引起的猜忌氣氛，從此形塑著台灣的省籍政治。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源頭。

1949年12月，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敗給中國共產黨，因而撤退到台灣。從五〇到六〇年代，美國根據雙方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確保台海的安定，從而提供了台灣政局穩定、經濟持續發展的安全保證，而國民黨則仍然不斷重申要「消滅共匪、反攻大陸」的決心。國民黨的政治體系基本上是效法列寧黨國體制的一黨專政、集權統治。蔣中正是國民黨主席，也是中華民國總統和三軍統帥，握有所有重大決策的最終決定權。國民黨在地方政治層次引入民主選舉制度，讓台灣人只能以有限的管道參與政治，而這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基本特質。在這樣的情形下，政治反對勢力幾乎被全面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在戒嚴法與「動員戡亂」的戰時法規管制下，也處處受限（見第三章的討論）。

經過二十年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七〇年代初台灣遭逢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黨政府所面對的外交挑戰中，最重大的莫過於美國開始試圖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而逐漸減弱它對台灣保有聯合國席次的支持。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並排斥台灣，使得台灣在宣稱合法代表全中國的鬥爭中，宣告失敗。

1975年4月蔣介石過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蔣介石兒子蔣經國則於1976年11月出任國民黨主席，並於1978年當選為總統。儘管國民黨曾推動溫和有限的改革，但蔣經國主政初期的政治獨裁本質並無太大改變。台灣人的政治反對運動，則在這段期間開始顯著地發展。1979年開始，美國終於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表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主張，有所認知。在這個外交鉅變帶來的政治紛亂中，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繼續在全島積極組織動員，以爭取民眾支持。然而1979年在南台灣第一大城市高雄所舉行的世界人權日遊行，最後使得許多全國性的反對運動領袖與地方的政治反對運動者遭到逮捕。這次的高雄「美麗島事件」，導致八〇年代前半葉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反對運動中角色愈來愈重要的激進人士，開始採取升高衝突的方式推動台灣民族主義。他們的動員策略和意識形態，啟發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與歷史學者等，逐漸激起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正在這個階段逐漸浮現成形。

1986年9月，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終於成立，並於1987年戒嚴解除後獲得合法地位。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容忍，這預示了接下來的歷史發展中，面對反對者的挑戰，國民黨被迫必須進行的一連串政治改革。這些改革，營造了比以往更有利於反國民黨人士從事政治競爭的環境。

絕大多數的民進黨支持者是本省人，反對運動的領導核心也幾乎都由本省人組成。自從民進黨成立以來，它便不斷推動台灣獨立，挑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民進黨及其支持者而言，中國民族主義被用來正當化外省人對台灣的宰制，也使得國民黨以反共動員戡亂為藉口來壓制公民權與政治權

利，看起來順理成章。民進黨的政治綱領主張台灣重返聯合國，並且由台灣住民自決，以選擇台灣未來的政治方向。儘管國民黨政府仍然壓制，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後半葉，追求台灣獨立的運動迅速地發展。整體來說，在這段期間，國民黨的政治控制確實逐漸放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姿態，在國際政治領域愈來愈活躍，民進黨除了挑戰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之外，也強調他們拒絕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在這段期間，主張台獨的人文知識分子更熱烈地投身政治，也推動一波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風潮。由於言論日漸自由開放，加上台灣民族主義顯著發展，在九十年代初期，傾向於主張台灣與中國統一、以及支持台灣獨立的民眾之間，形成嚴重的緊張關係。從此之後，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相互衝突帶來的緊張，一直深刻影響著台灣各種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議題。

1970年代初期，為了回應外交挫敗連帶而來的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危機，蔣經國曾提拔支持國民黨的台籍菁英進入黨政高層。技術官僚出身的本省人李登輝，在1984年成為蔣經國的副總統，並且在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後，繼任為國民黨主席與中華民國總統。而伴隨著政治自由化與反對運動的發展，執政的國民黨也大幅邁向「台灣化」，亦即有越來越多的本省人在李登輝掌權後，被指派擔任黨內與政府要職，因此決策核心內的本省籍人數，也開始超過外省人。此外，在1991年，三個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裡所有終身職委員（絕大多數為外省籍）全部退職，新的中央民意代表也由選舉產生。

國民黨內反對台灣獨立或支持兩岸統一的外省籍菁英，對於民進黨與國民黨內本省籍對手的挑戰，都倍感威脅，因此他們開始集結組織，於1993年成立「新黨」。1993至1995年間，新黨與民進黨各自動員其支持者，而國民黨本身仍繼續台灣化。主張統一與主張獨立的民眾之間的衝突，達到頂點。不過自1990年代初以來，雖然在更趨自由開放的政治氣氛中，民眾的政治關懷與利益日漸複雜，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相當顯著地增加，而自認是中國人的民眾人數則急遽下降。在此同時，民進黨的政策變得更加重視實際（見第四章的討論）。為了吸引更多中間選民的支持，這個最主要的反對黨開始以較不強烈的方式處理台灣獨立問題。相較之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自從八十年代上半葉受到反國民黨的政治人士（他們許多後來成為民進黨的創黨成員）啟發而形成以來，逐漸獲得本身發展的動力。在諸如文學作家、文學評論家、台語復興運動者、業餘與專業歷史學者、民俗研究者等人文知識分子之間，台灣民族主義發展快速。本章一開始所提到1996年春第一次總統大選後，「建國會」為一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發出不滿民進黨的聲音。這些堅定的台獨理念支持者，正包括許多我們所討論的那些人文知識分子。建國會在1996年10月成立的六個月之後，一部分幹部組織了「建國黨」。該黨綱要求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台灣共和國，並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以入侵台灣來壓制台灣的獨立建國。正當民進黨緩和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時，建國黨則和建國會一樣，成為明白堅定地倡議台灣獨立的人士所集結的重心。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當代學術界研究民族主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企圖闡明國族的現代性。雖然學者們對於現代民族主義源起的確切時間仍眾說紛紜，但大致都同意應該不會早於十七世紀英國反抗君主政體的時期（Calhoun 1993: 212）。為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學者們各自看重不同的解釋因素，例如：現代國家的興起，這可視為在國家間相互競爭的脈絡下，一種行政權力向中央集中的過程（Giddens 1985；Tilly 1990；Mann 1992）；現代國家的發展，它造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差異（Breuilly 1982）；工業化，它需要流動的、識字的、並且具有文化同質性的民眾（Gellner 1983）；報紙與小說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它讓在一個特定行政統治領域內原先沒有人際接觸與社會交集的個人，能夠發展出彼此間的連帶感，最後則形成一種「想像的」國族共同體（Anderson 1983）；另外的一個解釋因素，是一種渴望歸屬於某個既同質又穩定之群體的需求心理，因為這種群體已經因為家族、社區與宗教的連帶關係削弱而支離破碎了（Kedourie 1993 [1960]）。儘管學者們對這些不同的解釋因素的重要性看法不同，但他們大多數仍同意民族主義是特別屬於當代的現象。一些學者清楚指出，唯有現代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科技、與其他社會發展條件的匯聚下，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才有可能出現（Hobsbawm 1990: 9-10；Eriksen 1993: 101-107；Calhoun 1994: 315）。

強調民族主義的現代性的理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是將民族視為一種集體認同，它基本上依賴文化建構而發展，而這種文化建構由那些追求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或者由已經存在的國家所推動。「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造了民族主義」（Gellner 1983: 55），或者「民族並沒有創造國家與民族主義，而是國家與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Hobsbawm 1990: 10）之類的說法，都已經成

為老生常談。這種論點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對「演化決定論」（認為民族的產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的高峰（Smith 1993: 10）。

非演化決定論觀點的典型代表，即為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社群」或「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理論。對Anderson來說，任何種類的社群認同都是想像力所建構的。他寫道：

事實上，所有的社群，只要其規模大於人們可以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落，都是想像出來的（甚至即使原始村落本身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區分不同的社群，靠的不是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Anderson 1983: 6）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將民族定義為「一個想像的政治社群」，而這本名著的主要目的，正在於解釋民族如何被想像與如何誕生。為了詳細說明民族為何、且如何被想像成「本質上既有限，而又具有主權」，Anderson首先提到一些普遍的條件，例如一些主要宗教的地位日漸低落、君主王朝政體的式微、以及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念的形成。更具體地說，他關注1776至1836年間美洲一些新國家的建國經驗，認為這些國家提供了民族做為一種想像的社群的最早模式。根據Anderson的說法，由於三種社會歷史因素的結合，才促成這種新穎的意識的出現。第一，這些南美洲每一個新誕生的共和政體，好幾世紀以來都曾經是殖民地的行政單位，而這個事實，使它們具備獨立自主的性格。第二，美洲出生的歐裔（creole）官員在一個殖民行政區內的「朝聖之旅」（pilgrimage），亦即他們被限制在特定行政單位內的生涯經歷，有助於這些官員之間產生彼此互相連結的感受。第三，報紙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讓一個行政區內閱讀相同報紙的讀者群之間，創造出一種社群意識（Anderson 1983: 9-36, 47-65）。Anderson強調，這個民族模型一旦在南美洲被建立起來，世界各地便有人跟隨仿效。「『民族』因此變成某種能夠讓人們從一開始就有意追求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慢慢才變得清楚的視野架構」（Anderson 1983: 67）。

確切來說，Anderson的核心關懷在於為何這種新的集體認同類型會呈現為這種形式（form），以及這種想像的方式究竟如何出現，但比較不在於關注「這是誰的民族主義」等更具體的問題。他研究焦點所在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做為「某種關於社群、以及社群應當如何被組織起來之新觀念」（Breuilly 1996 [1994]: 159），亦即關注的是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般普遍的性質。雖然Anderson的分析主要基於南美洲的實際例子，但他的研究重點，不在於特定社會所出現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徵與內涵。一如Anthony Smith所評論的，Anderson的理論忽略了下列問題：「民族指的是誰？為何是這些民族、而不是指其他民族？」（Smith 1993: 20）從目前對台灣民族主義起源的相關研究來看，Smith對Anderson的研究取向的批評可以說是恰當的。接下來就讓我們討論這些研究。

許多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的相關研究，都受到作者本身的政治立場所左右，而這些作者都提倡特定的政策（例如蕭行易 1990；馬起華 1992；林勁 1993；黃昭堂 1994）。這類的著作，事實上經常可以歸類為政治評論。除此之外，關於這個議題，僅有少數問題意識清楚、而且具有理論旨趣的研究。整體來說，這些少數的研究可分為兩類：其一筆者稱之為「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其二是「政治競爭」的研究取向。

採取「想像的共同體」取向的研究，都受到Anderson的理論所啟發。日本學者若林正文，最早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是這個研究取向的開拓者。為了解釋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民族」概念的形成，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內部台灣獨立運動的快速發展，這個取向的研究主要強調兩個因素。第一，做為台灣第一個現代的國家機器，日本殖民政府全力推行的交通運輸、傳播、行政體系、以及教育的現代化，滲透傳統的地方社群。在一定的程度上，現代化模糊了漢人內部福佬人與客家人的界線。因此地方的與族群的社群，都被整合融入一個以全島嶼為範圍、剛剛萌芽的「想像的政治社群」。按照若林正文的論點，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是1920年代初期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所開始組織的反殖民運動。他們的組織發行的刊物，成為台灣「印刷資本主義」的先鋒。若林正文強調，由於這些刊物的宣傳與二、三十年代許多的反殖民抗爭，使得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政治化。傳統的漢人民族意識因此轉變成一種對立於殖民者的台灣人認同感。台灣的漢人，因此經歷了逐漸歸屬於台灣人「想像共同體」的經驗（吳密察、若林正文 1989: 186-187；若林正文 1994: 50, 52-55）。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用來解釋台灣民族認同浮現的第二個因素，是戰後國民黨的統治。這個取向的研究，強調國民黨的統治對於台灣民眾反抗中國認同、形成台灣人認同來說，相當重要。一直到198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以「統合主義的威權體制」（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方式控制各種社會的力量，這使得它既能在台灣立足，又得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爭。在1987年台灣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

大陸之前，官方禁止海峽兩岸人民有所接觸。若林正文認為，儘管事實上國民黨政府不斷宣傳「中國民族主義」，也就是Anderson分類下的一種「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但台灣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政治社群，這種在日本殖民時期形成的觀念，更在國民黨的統治下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若林正文 1994: 55-56)。此外，若林正文也應用Anderson的「朝聖之旅」概念來解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他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以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立，兩者皆有助於創造出以台灣為範圍的朝聖區域，亦即讓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形成的社會母體。

「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的優點，是對於民眾將台灣視為獨立政治體的廣泛認同感在發展時所處的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提供了很好的描述。但是，一如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聯」(Breuilly 1996 [1994]: 147-148)。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發展，通常有賴文化知識分子與政治運動人士的動員、以及被動員的特定政治變遷情形而定。換句話說，「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所指出的浮現中的國族認同，顯得有如鐵板一塊般地過於整體單一，而它所依賴的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究竟是什麼，則顯得非常模糊。台灣民族主義被視為唱出民族之歌的單一聲音。關於「這是誰的台灣民族主義」此一問題，「想像的共同體」研究取向只能給出相當有限的答案。相較之下，從「政治競爭」角度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則對民族主義發展的社會能動性問題，提供更多令人滿意的解釋。

「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典型之一，是王甫昌(1996)的傑出研究成果。他指出，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在中華民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政治民主化。不過令人出乎意料的，1980年代初期反對運動開始往民族主義的方向發展。王甫昌解釋了這個重大轉變發生的原因，也說明了政治反對運動者如何訴諸民族主義，以做為替代的政治策略。他指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省籍平等，是反對運動者追求政治自由化的核心議題，而美麗島事件代表這種追求的重大挫敗。反對運動者的強烈挫折感，以及八十年代上半葉國民黨政府的嚴厲壓制，使得反對運動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動員策略變得更加激進。台灣的政治反對運動者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基礎，正是官方所宣傳、具有相當沙文主義色彩的中國意識。他們認為，這種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正當化既有的社會政治形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在省籍關係上的不平等。為了挑戰這種意識形態，政治反對運動者開始發展一套台灣民族主義論述。此外，王甫昌也指出，1986年之後集結在新成立的民進黨下的反對運動者，發起了許多群眾集會與街頭抗議，以動員社會的支持。在這種過程中，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訴求，進而使得民進黨的支持度顯著增加(王甫昌 1996)。

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確實是國民黨政府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長期以來對抗的結果。「政治競爭」研究取向的長處就在於告訴我們，民族認同並非理所當然之事。相反的，它是逐漸浮現形成的，而政治鬥爭則常常是讓族群性(ethnicity)蛻變為民族性(nationality)的催化劑。由於聚焦於政治衝突，這個研究取向顯示特定的政治行動者如何建構台灣民族認同，以動員民眾的支持，追求新國家的建立。這個研究取向闡明了台灣人做為一個受宰制的族群，如何運用民族主義以挑戰統治他們的國家。因此以下我們有必要討論被宰制的族群及其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作者簡介

蕭阿勤 (A-chin Hsiao)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社會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專長為文化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研究興趣包括民族主義、集體認同與記憶、歷史意識、時間、敘事、族群與世代等。著有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第二版，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與John Makeham合編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書籍目錄

序

第一章 導言

- 一、概述：台灣的人民、語言與歷史
- 二、當代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 三、被宰制的族群、民族主義與人文知識分子
- 四、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民族主義
- 五、文化特殊性的政治
- 六、現代化意識形態與文化民族主義
- 七、散布的管道
- 八、本書章節安排

第二章 日本殖民統治與文學、語言問題

- 一、1920年代的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人反抗運動
 1. 改良主義的反殖民運動
 2. 激進的反殖民運動
- 二、日本殖民的語言同化
- 三、殖民地台灣的文學和語言改革
 1. 1920年代：白話文學和中國國語
 2. 1930年代：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
 3. 殖民統治與台灣文化特殊性
 4. 漢民族文化認同的延續
- 四、結論

第三章 戰後語言問題與文學發展

- 一、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初期互動和語言問題
- 二、國民黨統治初期與二二八事件
- 三、1947-1949年的文學辯論
 1. 國民黨統治初期台灣作家的處境
 2. 文學辯論：殖民統治與台灣語言文化的獨特性
- 四、1950與196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
- 五、五、六年代的戰鬥文藝、國民黨意識形態與現代主義文學
- 六、鄉土文學論戰
 1. 1970年代初的政治變化與「回歸鄉土」文化潮流
 2. 鄉土文學與論戰：反帝、左傾與地方色彩
- 七、結論

第四章 確立民族文學

- 一、1950年代的本省籍文學作家
 - 二、早期的《台灣文藝》與《笠》
 1. 吳濁流、《台灣文藝》與中國文化
 2. 《笠》詩人與中國現代詩創作
 3. 《笠》、《台灣文藝》與鄉土文學
 4. 《笠》、鄉土精神與中國現代詩
 - 三、1970年代國民黨的統治與台灣政治反對運動
 1. 外省人的政治宰制與本省人的政治權力上升
 2. 黨外的興起
 3. 美麗島事件與反對運動激進化
- 四、台灣意識論戰與鄉土文學
 1.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
 2. 鄉土文學與台灣意識

五、陳映真、葉石濤與鄉土文學：中國史觀與台灣史觀

1. 葉石濤：台灣鄉土認同與中國國族認同的平衡
2. 陳映真：中國民族主義與「在台灣的中國文學」

六、1980年代前半葉「去中國化」的台灣文學

1. 文學的政治化
2. 什麼是「台灣文學」？：入世精神、抵抗意識與本土化
3. 台灣人的形象
4. 日本殖民統治做為一種「資產」

七、1986年以後的政治變化

1. 台灣民族主義的顯著發展
2. 國民黨「台灣化」
3. 新的族群分類與新的國族認同

八、建立民族文學：1980年代下半葉及之後

1. 民族主義文化論述的浪潮
2. 一個變數：中華人民共和國

九、塑造民族文學

1. 書寫台灣人的台灣文學史
2. 建國的文學
3. 台灣民族文學：四大族群，合而為一

十、結論

第五章 締造民族語言

一、官方語言政策及其結果

1. 國民黨的語言政策與意識形態
2. 被壓迫的本土語言：台語
3. 台語：族群象徵與復興

二、確保民族語言

1. 台語的命名
2. 台語書寫系統與台灣民族主義
 - 2.1 早期的台語書寫史
 - 2.2 1987年前後的台語寫作
 - 2.3 台語書寫系統與構想

三、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重新定義

四、結論 270

第六章 書寫民族歷史

一、國民黨的統治與中國史觀

1. 史觀與統治的正當化
 2. 尋根、愛鄉更愛國
 3. 台灣史研究：中國研究的次領域
- #### 二、台灣史觀的發展與台灣民族主義
1. 早期海外反國民黨的台灣史學
 2. 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史的政治化
 3. 日本殖民時期的「重現」：反對運動的教訓
 4. 帶入原住民、挑戰漢族中心主義
 5. 台灣史觀：走向民族的歷史
 6. 挖掘二二八史實：書寫民族史詩
 7. 重探平埔族史：想像多元族群的台灣國族

三、結論

第七章 結論

一、台灣民族主義做為歷史的「晚進者」

二、對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再思考

1. 土壤中等待萌芽的種子？
2. 「假」認同？

附錄

- 一 民族主義研究者與蝙蝠
- 二 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權力
- 一、前言
- 二、本土化典範的兩種類型與敘事認同
- 三、文學的敘事的本土化典範與意義的封閉（解釋一）
- 四、「策略的本質主義」只是策略的？（解釋二）
- 五、誰的知識？知識的目的為何？（解釋三與結語）

參考文獻

名詞索引

人名索引

圖表目錄

第一章

圖1-1 建國會與教育本土化（台灣化）聯盟成立的報導

第二章

圖2-1 陳炳在《台灣青年》創刊號發表的 文學與職務

圖2-2 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 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圖2-3 《南音》所刊載提倡鄉土文學的言論

圖2-4 郭秋生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的 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 與在《南音》發表的台灣話文創作

圖2-5 《南音》刊登廣告，徵求以文言、白話或台灣話文描寫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創作

圖2-6 賴和、郭秋生與黃石輝在《南音》討論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

第三章

圖3-1 《台灣新生報》「國語」週刊第1期與吳守禮的 台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

圖3-2 1947年《台灣新生報》「文藝」副刊上外省籍作家江默流論台灣文藝

圖3-3 1948年《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外省籍作家田兵論台灣新文學

圖3-4 《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上葉石濤對外省籍作家的回應

圖3-5 《新生報》「橋」副刊上瀨南人對錢歌川、陳大禹的反駁

圖3-6 1955年8月29日《聯合報》關於戰鬥文藝的報導

圖3-7 《聯合報》刊出彭歌對鄉土文學的抨擊

圖3-8 《聯合報》刊出余光中對鄉土文學的批判

圖3-9 1977年8月29至31日國民黨召開「文藝會談」的新聞報導

圖3-10 1977年8月《夏潮》以鄉土文學為專題

第四章

圖4-1 《台灣文藝》創刊號封面與目錄

圖4-2 1977年第57期的《台灣文藝》以李喬作品研究為專輯

圖4-3 1964年《笠》詩刊創刊號封面與目錄

圖4-4 1983年6月《前進週刊》討論侯德健潛往中國大陸事件

圖4-5 1983年台灣意識論戰期間的《生根週刊》

圖4-6 葉石濤於1965年發表於《文星》的 台灣的鄉土文學

圖4-7 1977年5月刊出葉石濤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 的《夏潮》封面（封面誤為 序論 ）

圖4-8 1982年《文學界》創刊號

圖4-9 1984年陳芳明發表在《台灣文藝》的 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

圖4-10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1957年日文版、1959年與1962年的中文版

圖4-11 1983、1985年《台灣文藝》呼籲「擁抱台灣的心靈、拓展文藝的血脈」

圖4-12 1986年《台灣新文化》、1989年《新文化》創刊號

圖4-13 1987年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

圖4-14 1991年《文學台灣》創刊號

第五章

圖5-1 1960年《徵信新聞報》上提倡說國語的文章

圖5-2 政府推行國語、壓制本土語言的各種新聞報導

圖5-3 1985年10月26日教育部擬定 語文法 草案的新聞報導

圖5-4 成功大學開設台灣第一個台語課程的新聞報導

圖5-5 以羅馬拼音台語發行的1939年元月份《台灣教會公報》

圖5-6 1950年代國民黨禁止基督教長老教會使用羅馬拼音的報導（1957年10月12日與1958年2月26日《聯合報》）

圖5-7 林宗源1955、1962年創作的台語詩

圖5-8 向陽1976年創作的台語詩

圖5-9 由左上、右上、下：宋澤萊、黃勁連的台語詩各兩首、林央敏的詩作一首

圖5-10 1980年代下半葉《台灣新文化》積極刊登台語文學作品

圖5-11 1980年代下半葉《台灣文藝》刊登台語作品、提倡台語文字化

圖5-12 林繼雄的著作與其中台語羅馬拼音作品

圖5-13 鄭穗影的著作與其中全用漢字書寫的台語章節

圖5-14 鄭良偉的著作與其中漢、羅併用書寫台語的篇章

第六章

圖6-1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國民黨宣傳中國史觀的台灣史書籍

圖6-2 1980年11月12日《中國時報》報導政府發起「愛鄉更愛國」運動，重申「台灣是中國人的台灣」

圖6-3 1975年12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刊出李國祁論台灣內地化的文章

圖6-4 1984年陳其南論台灣漢人移民社會土著化的文章

圖6-5 蘇新、史明、王育德的台灣史著作

圖6-6 1984年林濁水編輯的《瓦解的帝國》

圖6-7 1983年鄭欽仁在《台灣文藝》發表論台灣史觀的先驅文章

圖6-8 1995年9月《台灣歷史學會通訊》創刊號

圖6-9 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台灣新文化》關於1987年2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活動的報導

圖6-10 1991年6月30日《中國時報》報導民間抗議政府破壞十三行史前遺址

附錄二

表1 中國民族主義的「台灣鄉土文學」敘事模式

表2 中國民族主義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敘事模式

表3 台灣民族主義的「台灣文學」敘事模式

精彩短评

- 1、台湾对「国族」建构经验，可以清楚看到是于个体和群体的作用与区别，达到暂时共识的不过是「一时之需」（经济或政治）。学术界能贡献的，就是对本质化认同论述的一种干扰破解，即使那只是缓慢而微不足道的。
- 2、很扎实的研究，考察了90年代末之前，台湾的身份认同变化和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辅以台湾自清朝以来的政治史背景介绍，全书基本围绕着语言、文学、历史书写三根主轴展开讨论，尤其以三个章节重点论述了80年代党外反对运动全面兴起以来，台湾意识作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论述，在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兴起过程，涉及乡土文学、国语讨论、史观讨论等关键事件。
- 3、台独在构建台湾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也把大陆想象描摹了一番，其实他们所认识的大陆，不过是井口那一丝亮光而已。
- 4、重构台湾的同时却重构中国
- 5、从语言政策、文学思潮、历史观三个角度切入梳理台湾民族主义的生成，颇有趣。回头找罗永生写的香港版。隔着安全距离看历史发生是有趣，但离香港现实太近，恐怕有趣不起来，只是忧虑和压抑。几天前学生会换届，本土派攻陷了我校左翼大本营，我所认识的中大也都变了。
- 6、重点剖析了台湾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看完受益颇多

1、本书重点讨论了1980、199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在文化界的传播，对文化的台湾本土化提供较为全面的描述与分析。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基于捷克历史学家Miroslav Hroch的观点，Hroch在研究中欧、东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形成过程的时候提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通常有三个基本发展阶段：从（一）知识分子致力发掘、阐述、宣扬潜在的民族语言、文化、历史特质，到（二）许多活跃分子的小团体具有组织性的政治行动、致力于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然后又发展到（三）较具规模的群众动员与运动。作者针对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对Hroch的理论做出了修正，他认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第二个阶段要早于第一个阶段，文化界的台湾民族主义受到政治反对运动被激发，略晚于政治反对运动者。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台湾后来很多转变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的文化精英或人文知识分子如何解说个人或集体的认同，重建记忆、重写历史做了梳理，为读者展示了台湾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从萌芽到茁壮成长的过程。作者在序言中说“世间的矛盾事物往往并存，相互激荡。社会变迁的快速阶段，人们寻找稳定的力量；充满遗忘的时代，人们渴求记忆；充满‘相信’的时代，人们盼望解放；充满‘不相信’的时代，人们追求信念。信念，可以来自单纯的价值坚持，但经常必须来自与历史的联系，在不断逝去的时间洪流中寻找生活的定位与存在的价值。”这一段看起来并不那么社会科学的文学式的语言，就是本书的全部架构，那就是台湾最初的反抗运动就是在反抗国民党的为了维护法统的威权统治，本土的文化被压制。在一系列变故如“退出联合国”、“民主化”，伴随而来的是威权体制所维护的“大中国”意识的解体，人们在追寻自己是谁，未来怎么走的时候，独立见见成了信念。或者说在本书中台独的信念，常常来自知识分子、作家重新发现的、描述、解读的历史来给希望的独立来寻找正当性。而后作者对台湾文学、语言、历史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二十年中的变化做了梳理，他认为台湾文学的成立、台湾本土语言运动的兴起和台湾史观的发展等，是台湾文化本土化、台湾化的领头羊，是台湾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的主要部分。作者认为这一部分是“台湾民族主义”发展和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二步而不是第一步，作者不止一次提到台湾与其他地区的差异，却没有分析这种差异的产生为何，只是单纯描述这个过程而已。探讨这个问题，虽然对描述整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却可以对此民族主义发展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弊病、对台湾的影响做出评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在这一轮的语言、历史重新认识、发现、书写以前，普通民众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遥远的唐山过台湾是本省人的历史记忆，更不论是1949年到来的外省人。哪怕是经过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依然没有产生“文化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是另外一个民族。恰恰是在殖民时期的一系列有关“台湾”的反思，可以认为是比较接近Hroch的观点，因为在日常生活重点语言、习俗和日本人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普通人在生活中最能够感受到的。而台湾光复、乃至1949年以后，纵然大陆各省移民所带来的风俗习惯有所差异，但是在国语运动下，原本都以汉字为书写体系的语言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巨大。同时尊崇祖先、儒释道和民间宗教是基本上所有汉族的共同信仰。在两岸隔绝交流的年代这些共享的文化使得台湾民众没有觉察到自己与大陆其他民众的区别。另外，不能说台独运动是完全在反抗国民党威权体制时才萌芽的，事实是早在台湾光复回到中国时候就有。只不过在台湾戒严时期，很多持台独立场的人是不能回到台湾的，都流亡在日本。因而，在社会控制放松之后，这批人回到台湾开始鼓吹台独，反而是比文化界的自觉要更早。而后当台湾独立运动发展起来之后，文学、语言、历史的文化界人物开始建立一个“台湾民族”了。但是这种台湾民族如果是和大陆的中国人一样的，那凭什么说自己是另外一个民族，也不符合所谓的民族自决，从而失去了独立的号召力与合法性。王明珂在《华夏边缘》里引用Barth的理论，解释道：“将族群当做是主观的认同，并不表示体制与文化特徵就毫无意义了，他们不是客观划分族群的标准，但的确是人们主观上用来划分人群的工具。”人们依靠“边缘”来明确自己的认同，但是相对于王明珂的“圆圈论”，我更倾向于将这个边缘模拟成生物学上的细胞膜，细胞膜上有糖蛋白，能识别外来的物质，需要的就放进去，不需要的就挡在外面。人们的认同就如同一个细胞膜，然后取舍这些客观存在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构建自己认同的就采用，不能的就舍弃。在在完成者这个认同的同时就是在人为地製造一个边缘。认同先于边缘而存在，而不是由于客观边缘的存在造成了认同的差异。在文化人形成了台独的观念之后，就开始采集两岸的不同点，这就是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原本不带政治性的不同点会被放大来检视，努力找出台湾与大陆的“不同点”，并且努力赋予他政治性、民族性，汉字的繁简之争就是最好的注脚。而台湾在重构台湾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的台湾意象来表明自己与中国大陆的区别，自己是独特的，但是这种

文化上的牵连实在深入生活、意识方方面面，在重构台湾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重构大陆。所以，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污名化就很容易理解了。例如台湾保存传统文化，大陆没有；台湾人血统与大陆人不一样；就连孕妇生完孩子要坐月子这样的事情都可以是台湾发明的，这一切只不顾是要说明我们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可是中国实在太大，各个省之间本身就有亚文化存在，大陆人在习惯了彼此之间的不同之后，就会对台湾这种看大陆的方式哑然失笑。并且除了原本的文化因子，台湾还在前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强烈的优越感，在此之上的开放、包容、统统都和保守、极端的中国文化不一样。台湾是重构的，大陆也是重构的，只要还需要台独，对大陆的我群优越感是不会改变的。。。。。。不想写了，有空再补吧。。。

2、和萧阿勤老师面谈过，我说台湾本土化的过程中对岸的福建也在本土化，以保护闽南语（台语-福建话）语言政策为例，在不同政治实体的情境下闽台两地政府的语言本土化政策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是冲突的历史叙事。老萧说这个想法不错，可以展开写成博论，只是自己心不在研究民族主义，所以也就浅尝辄止了。台湾民族主义研究基本可以概括为两个派系，一个是吴叡人和吴乃德老师的“本体论”导向，两个人的文笔极好，但感觉他们写的文字更适合当文学作品看，情感化成分太多。个人比较赞同台“中研院”萧阿勤和汪宏伦老师的“制度论”导向的研究，用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将台湾民族主义的演化置于（两岸长治分治）的制度框架下。这本书横跨的历史跨度为战后，如果要了解战前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那可以结合骆明正老师《疆界内医生》这本书一起念。无论是《重构台湾》抑或是《疆界内医生》，落脚的社群都是台湾在地精英，对于平民因为资料原因却鲜少着墨——萧阿勤老师的指导学生已经做了有关台湾平民阶层认同转换上的研究，算是对《重构台湾》这本书的扩展。其实念完这本书对于我最大的启示是：重新反思何为“中国”？读了一些台湾民族主义方面的书籍，感觉“中国”这个词在台湾精英笔下被异化和扭曲得相当严重，在课堂上和同学老师反复争论的一个点也是：作为如今台湾民族主义的重要靶心“中国”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今天台湾精英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仍然停留在国民党渡海而来的带有狭隘大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民族主义，但台湾民族主义者却把现行台湾的汉族中心式的“中國民族主义”，和中国大陆经过改良的更强调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是错误的。民族国家作为现代世界人类认同的一种必需品，在全球化的情境下，民族国家间的竞争烈度只会更为激烈，民族主义也会被视为一个参与竞争的重要工具。而台港两地作为东方与西方、国家与一般地区的“夹生层”（In-between）的痛感，进而造成的认同的混乱与迷失，也只有港台两地人民能体会吧。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民族主义，仅是希望它的内涵能不断地丰富化、弹性化、包容化，不仅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内在需要，也是成为一个富强稳定繁荣的世界级大国的重要基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